

「能K能玩」：

明星高中的社團活動、升學實作 與青少年文化*

王啟仲**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藉明星高中青少年文化與教育經驗之間的關係，勾勒當代台灣升學體制運作的核心邏輯。研究發現明星高中興盛的社團活動關聯到 1980 年代末隨民主化、教改帶來的政策改變，及隨後在校園所興起的追求「能K能玩」的文化氛圍。在此轉型過程中，以往容易與「問題學生」畫上等號的次文化活動，逐漸在「菁英學生」的世界中取得正當性。學生競逐秀異地位的關鍵，也從過去的「讀好書考好試」轉變為「玩好也考好」。社團活動和考試升學在教育功能上有相互依賴、影響的關係：追求「休閒成就」的集體文化需求與升學制度交錯，使學生在社團參與也呈現填鴨學習模式，再製升學競爭邏輯；社團優異表現也強化學生對既有教育體制的認同。表面上明星高中學生有更多自由追求休閒成就，但研究發現，此種校園生活模式讓「休閒」與「課業」都在更壓縮的過程中進行。明星高中社團活動其實是由學業考試所延伸出的地位競爭場域，發揮讓學生順應以填鴨考試、競爭為核心的升學體制的社會功能。

關鍵詞：教育改革、地位競爭、社團、青少年（次）文化、生涯

台灣社會學第 36 期（2018 年 12 月），頁 1-46。DOI: 10.6676/TS.201812_(36).02

收稿：2017 年 12 月 29 日；接受：2018 年 12 月 21 日。

* 本文係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作者已先撰成英文論文“Schooling Youth (Sub)cultures in East Asian Education: The Case of High School Rock in Taiwan”，發表於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本文是針對台灣讀者群、在不同問題意識下撰成。與英文論文相較，本文除了不同的前言、結論與主要問題意識之外，也大幅增加了歷史脈絡、新的文獻對話和經驗資料，並在論證中加入新的理論視角。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cwangsoc@gate.sinica.edu.tw。

“Study Well, Play Well”: Extracurricular Club Activitie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Youth Culture in Taiwan’s Elite High Schools

Chi-chung W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academically elite students’ culture and their schooling experie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core logic of the exam-oriented educational system’s 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so doing, I first demonstrate that the thriving extracurricular club activities in publicly funded elite high schools are part of a wider subcultural milieu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lective pursuit of “dual excellence in both study and play,” which has been shaped by educational policy changes implemented since the late 1980s. Some particular subcultures --earlier associated with problematic, low-achieving youth groups --were gradually legitimized among academically elite youth du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Exam success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for high-school students to secure distinction within their peer group: Excellence in leisure activities is also pursued in this post-martial-law era. My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club activities and academic pursuits exist in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 collectively shared cultural need to pursue leisure accomplishments intersects wit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tudents adapt strategies characterized by rote learning to their club activities. First- and second-year studen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extracurricular club activities leads to them being willing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intensive rote academic learning in their third year, as they prepare for university entry exam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logic of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Students from elite public high schools seem to have more leeway and time to pursue leisure accomplishments. I argue, however, that both their leisure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proceed in a compressed manner. The thriving extracurricular club activity in public elite high schools is an arena extended from academic examinations for accommodating status competition, which functions to support students’ compliance with an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al regime marked by rote learning and intensive competi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status competition, extra-curricular club, youth culture, career

一、前言

激烈的升學競爭與階序化的中學教育是台灣升學體制的主要特徵。解嚴以來，儘管引入了簡化試題、多元入學等意圖緩和升學競爭的政策，前述現象非但沒有減輕，反倒隨著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高中教育的階序化日益嚴重，學生對於明星高中就讀機會的競爭也日益激烈（見黃春木 2008: 139-142）。不少本土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與學科立場來理解造就激烈升學競爭的相關原因與機制，範圍擴及文憑主義於工業社會中的制度化（楊國樞、葉啟政 1984）、政治經濟結構的歷史過程（羊憶容 1994；黃毅志 2011；鄭婉琪 2001）、社會心理基礎與文化根源（王震武、林文瑛 1994；王震武 2002）、教育政策與改革的歷史發展（黃春木 2008；蘇永明、方永全 2008）。除了少數教育學領域的碩士論文研究（吳佩穗 2001；林婉雯 2011；王心怡 2007；邱珮雯 2008；崔治中 2012），¹ 學生本身的升學經驗過程、校園文化生活與教育體制之間的關聯尚未在社會學領域中得到足夠關注。對我來說，前述現象還涉及下列尚待釐清的基本問題：「學生如何經驗升學體制？考試排名導向的競爭邏輯如何在學生校園生活中被維繫、強化與再製？」

近來一個和教改有關的現象有助於我們從青少年（學生）文化的角度來切入探討上述問題。在過去幾年開始施行十二年國教的過程中，不少明星高中的學生、校友皆對這一系列意在弱化學校地位階序的政策表達強烈反對。其中的主要反對論述，便是藉由他們的社團與次文化活動經驗來質疑外界對於「明星高中」的「誤解」。如下面這篇文章所述：

1 如同崔治中（2012）所評論的，這些研究多半僅停留在次文化現象的陳述——描述台灣校園青少年次文化的性質與樣貌，缺乏相關社會脈絡的解釋。王心怡（2007）與崔治中的研究雖然討論了明星高中女學生次文化與升學體制及社會脈絡的關聯，他們沒有進一步探討這些次文化如何對學生的社會生活與教育體制運作帶來影響，而這正是本文所要處理的。

外界對於建中的誤會實在太深厚了，我覺得我可以打一篇文章試著讓社會知道究竟建中裡面是什麼情況……高二的時候社團活動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大家願意為了同樣的事情努力……等到社團成發逼近，你出現在課堂的次數也許會逐漸減少，大家一定覺得學生不好好念書還蹺課玩社團成何體統？……高二因為玩社團，我決定去補數學跟物理……這樣我的學習效率比較高，多的時間就可以繼續再投入我的社團生活。²

在當時，類似說法可說不勝枚舉。³ 不論贊成或反對十二年國教，這些論述都點出了一個似存在已久，卻尚未被重視的現象：明星高中學生不僅會念書考試，其實更會玩；課業之外的活動、社團種類，反而是所有高中裡面最多元也最自由的。除了風氣、種類、數量，連相關活動的表現，也是明星高中學生最為優異，而學生們更以「能 K 能玩」自豪。對於念過明星高中的學生和校友而言，多元的校園次文化除了代表他們的教育生涯（educational career）已不再受到既有教改論述所批判的「升學主義」所箝制，更是他們用來捍衛考試體制與學校排序的重要理由。

青少年文化在學生經歷的社會生活扮演極度重要的角色；不論是社團參與、同儕群體互動都會影響他們的認同形成，並介入他們的教育與升學經驗。然而，這個部分在既有文獻中卻被嚴重忽視。本文透過明星高中學生社團的案例，探討青少年的校園次文化與升學實作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對於台灣升學體制帶來的影響。以下我先

2 見 JS CK63rd, 2012, 〈關於建中——為何我們對教改不合理之處會有聲音？〉。ETtoday 新聞雲論壇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501/42891.htm>, 取用日期：2015 年 4 月 27 日)。

3 例如《人本教育札記》276 期所刊登的兩篇文章：〈學生的自由與自主，不應只是建中的特權〉（胡詠晴）、〈對於北一女，大家有很多過度想像……〉（王士誠）；《蘋果日報》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的〈人間異語：資優教育扼殺我的發展〉（許哲輝）；東森新聞網路論壇於 2012 年 4 月 28 日刊登的〈建北現象為不實指控〉（阿動）等。

回顧西方相關文獻，指出青少年文化的探究如何有助於理解青少年的整體社會生活與轉銜過程；本文接著說明這樣的視角對研究台灣學生升學經驗能夠帶來什麼幫助。在主要分析部分，本文透過青少年文化相關理論探討台灣菁英學生的社團活動與升學實作之間的相互關係。我首先說明，明星高中學生如何經由看似挑戰父母、師長管教界線的校園（次）文化，強化與其他學校同儕之間的地位區別，並形成以「競爭、排名」為核心邏輯的社團活動參與方式；隨後接著展示，社團活動的進行如何受到考試導向的升學體制所限制、形塑；學生的社團活動參與，又如何回頭影響他們在教育生涯中，面對升學考試準備的策略安排與時間使用的選擇模式。最後我會進一步論證，考試導向的升學體制與競爭邏輯如何在兩種制度生活領域的交錯下進一步被強化、再製。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青少年次文化如何產生，其在參與者整體生活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何種社會功能，長期受社會學者關注。早期的次文化研究發展可追溯至芝加哥學派的偏差次文化理論（如 Cohen 1955; Becker 1963），隨後於英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 CCCS）得到進一步發展。該學派結合偏差次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命題，發展出次文化抵抗理論（subcultural resistance），主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青少年文化研究。CCCS 將工人階級青少年的次文化腳本（如反抗學校的偏差行為、奇裝異服等）理解為這些處於經濟弱勢的青少年藉由群體組織的方式，對於「他們與父母輩」共同面臨的階級條件與社會問題所進行的文化回應（如 Clarke et al. 2006[1975]; Cohen 1972; Hebdige 1979）。Paul Willis（1981）將這個理論命題擴展到工人階級青少年的校園生活，發展出影響勞動研究、教育社會學與青少年文化相關研究甚鉅的校園民族誌：*Learning to Labor*。

在 *Learning to Labor* 這本書中，Willis 拆解工人階級「小伙子們」（lads）的反學校文化，重探馬克思主義階級與勞動研究的經典提問：「為何工人階級子弟持續從事工人階級工作？」承繼父母輩「廠房文化」（shop floor culture）中的諸種工人階級文化形式，⁴ 小伙子們打造出一套拒絕學校權威控制的反學校文化，讓他們看穿（penetrate）自身在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中面臨的機會結構限制。小伙子們在學校中總是奇裝異服，並且伴隨著抽煙、打架、嘲弄乖乖牌學生等偏差次文化實作，削弱學校權威對他們施行的教育控制，掌握自主權。雖然小伙子能在次文化的空間中取得成就感與自主性，反學校文化的父權意識型態也為他們的反抗帶來「限制」，讓他們因為在集體價值上排斥理論知識與白領階級工作，從而走向複製父母輩職業選項的生涯轉銜路徑。

此外，Willis 在該書中揭示，探討「社會結構條件」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理解青少年社會生活與地位流動的關鍵。此研究取徑進一步影響了青少年轉銜研究的發展。傳統青少年轉銜研究關注被研究者身處的社會結構條件，如何為他們的生涯發展路徑以及規劃上的選擇帶來影響。⁵ 2000 年後越來越多來自這個陣營的研究者（Shildrick and MacDonald 2006; Hollands 2002; Nayak 2003）呼籲青少年研究在方法上必須同時注重被研究者的「生涯轉銜」與「文化參與經驗」，以建立一套對青少年社會生活更為「整體性」（holistic）的分析取徑。在一項關於北英格蘭工人階級街頭文化的研究中，Robert MacDonald 與 Tracy Shildrick（2007）分析了貧窮的物質條件如何限制當地青少年參與日常文化活動的選擇，並催生出以社區鄰里街道作為主要活動場所的「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次文化。⁶ 他們

4 例如組成小團體、反抗上司、強調對於自主權的掌控、輕蔑理論知識與白領工作。

5 CCCS 的次文化研究在戰後英國一度是青少年研究的主流取徑。隨著 1980 年代後青年勞動市場的崩解、日益惡化的青年失業現象，以及政策上的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到來，英國青少年社會學研究的主要關注，逐漸從青少年文化轉變為年輕人在生涯發展上面臨的社會結構處境，以及從學校教育到職場的轉銜過程（MacDonald et al., 2001）。

6 多半是一起進行未成年吸菸、飲酒、偷竊等偏差行為。

發展「休閒生涯」(leisure career)概念，⁷解釋青少年的生涯發展路徑如何被他們的「次文化參與過程」，以及「其他層面社會生活的轉銜過程」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所架構。在這個研究案例中，街角社會成員休閒生涯中的偏差同儕群體網絡，讓他們在轉銜的過程中，更容易從偏差淪落到嚴重的犯罪生涯，延續弱勢處境。

不論是芝加哥學派的「偏差次文化」，還是伯明罕學派的「次文化抵抗」，這些理論都強調要從青少年群體所座落的更大的社會與制度脈絡來理解次文化實作的社會意義與功能，進而掌握隱藏在青少年從事外人眼中看來反常的文化實作背後的社會機制。近期發展的青少年文化與轉銜研究取徑，則進一步把「(次)文化參與與認同」([sub]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的要素帶入青少年的生命階段、歷程發展研究中，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形塑關係。我將進一步展示，這些理論工具如何有助於理解台灣公立明星高中盛行的社團活動背後的社會意義與結構條件，並透過「生涯」概念來理解學生的文化參與和升學實作之間的相互關係，藉此重新理解台灣考試導向的升學體制運作的基本社會邏輯。

本文並非不加批判地使用他們的理論工具。這一系列理論發展最主要的缺失在於，他們側重弱勢階層青少年群體的研究傾向，為相關概念工具帶來兩個應用上的限制。首先，弱勢青少年通常面臨不利的生活條件，與暴力、犯罪有關的次文化經常成為他們在生存上不得不然的「替代方案」（如吸毒、偷竊），而這些次文化通常只會對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如加重蒙受污名的遭遇、或經常成為司法系統管制的對象）。批評者指出，從他們的社會生活經驗發展出來的理論，傾向於機械式的將「青少年次文化」等同於白人男性工人階級青少年的偏差或抵抗實作（McRobbie and Garber 2006[1975]; Bennett

7 「生涯」概念代表行動者在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像是家庭、教育、職業、休閒——所進行的選擇決策彼此相互影響的情況下，所經驗的社會發展、成長軌跡。在青少年研究的應用上，這個概念有助我們發掘行動者的選擇決策，如何和青少年在轉銜（transition）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機會結構彼此互相影響。

2000），從而忽略不同社會背景青少年的次文化活動，可能會有不同的社會功能、意義與後果。研究中產青少年文化的文獻指出，中產階級青少年次文化的參與者通常是「選擇」參與挑戰主流中產價值的次文化；他們較為優勢的社會背景與特質，除了能夠為他們免除掉某些因為進行反叛活動而可能對未來造成負面影響的「成本」，甚至還能夠讓他們經由挑戰主流價值的叛逆活動展現文化秀異（Wilkins 2008）。

Sumi Hollingworth（2015）在倫敦都會區的中學所進行的校園民族誌，為中產與弱勢青少年在次文化活動上的社會差異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她將Pierre Bourdieu（1984）的場域理論⁸應用到次文化研究，分析中產菁英青少年如何能夠運用自身優越的社會條件，在休閒活動的場域中藉由表面上看似叛逆、反學校的次文化，強化自身的優越地位，以此解釋社會不平等如何被再製到青少年次文化的領域。該校由白人中產青少年所組成的「哈煙族」（smokers），在次文化活動上展現出與「小伙子們」相似的「反學校」特質。他們經常集體公然在校門口抽煙，放學後「跑趴」、使用「娛樂性藥物」（recreational drugs），並經常在同學面前大聲談論這些事蹟。在校園生活中，他們藐視只會勤奮念書的乖學生，卻又能維持優異的在校成績，展現出輕易取得成就的特質（effortless achievement）。哈菸族具備的高量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良好的在校成績、另類卻符合中產階級品味的衣著風格——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優越的種族、階級特質，讓他們的叛逆次文化能夠在學校的制度空間中，取得被師長容忍、默許的正當性。此種正當性能進一步提昇他們的次文化在青少年同儕間的優越地位：與其他弱勢青少年的叛逆次文化相比，他們除了會念書，也進行看起來很「酷」的叛逆舉動，並享有不受責罰的

8 Bourdieu（1984）認為，文化品味（taste）的展現是優勢階級用來鞏固自身地位，再製不平等關係的重要手段。高社經地位的行動者，能夠藉由自身所累積、受到社會所認可的「文化資本」（通常要經由所累積的經濟資本進行轉換），展現出自身與眾不同的見識與品味，強化自身與他者在社會空間——即由不同社會位置所構成的「場域」（field）——中的地位差異。

特權；他們的叛逆生活方式也讓他們能與傳統好學生的乖乖牌形象保持距離，並且贏得具備了「獨立、自主、自由」等特質的「理想學習者」（ideal learner）的美譽。相比之下，該校來自弱勢社經背景的學生群體缺乏受學校體系認可的資本類型，他們的次文化通常只會強化外界對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讓他們持續成為需要被監督的對象。

這些著作為本文在分析上帶來的啟示是，同樣是涉及挑戰主流價值的次文化，卻會因為青少年不同的社會位置與所持有的「資本」，帶來不同的社會後果：缺乏正當資本的弱勢青少年的次文化通常加深負面刻板印象，具備正當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優勢青少年，則能透過次文化取得像是「自主、創意」等正面評價，並藉由獨特的生活風格與品味強化與他者的區別。在後面的分析中，我將藉此分析策略，說明台灣公立菁英高中學生所處的優勢結構條件，如何形成一個集體追求「能K能玩」的校園次文化，讓這些菁英學生能透過表面上看來叛逆的文化活動，在同儕間取得優越地位。我還會接著說明，此種混雜著叛逆與秀異的次文化氛圍，如何讓課業領域中的競爭邏輯延伸到學生的社團領域中，在活動的進行上也需要追求「可比較排名」的成就。

側重弱勢階層青少年群體的研究取徑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忽視在多數青少年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校教育經驗」（schooling），對於文化參與、認同形塑帶來的重要影響。特別在近期發展的有關青少年文化與轉銜的一系列研究中，探討的對象多半是在較早的階段就經常逃課、甚至輟學的弱勢青少年（如MacDonald and Marsh 2005; MacDonald and Shildrick 2007），或者是那些因為在學校被貼標籤為「失敗者」而與學校有所疏離的群體（Nayak 2003），因此「學校教育制度」在他們的理論架構中並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對於多數青少年來說，升學過程中常見的諸如考試、排名、分流、能力分群等制度安排可說構成了他們日常活動的核心。在前述西方青少年文化的主流理論中，這些機制卻因為多數研究者對弱勢青少年的過度關注而被嚴重忽視，導致相關理論在應用到和學校生活更為緊密相連的

青少年群體（如中產階級青少年）時會容易受到限制。

在東亞地區，青少年群體的形成經常是基於「好學校」與「壞學校」的區別模式。此分化機制主要受到標準化的考試排名、學校分發制度所形塑，並且在社會地位群體分類以及文化成就取得的層次上，「象徵性」的掩飾（obscure）了社會階級帶來的影響。舉例來說，Katsuya Minamida（2014）在他對於日本熱門音樂青少年群體與反抗的研究中指出，相較於歐美常見的階級和種族，日本青少年的階層化與分群樣態主要基於個人學歷成就，而教育系統中以成績差異為核心的標籤分類機制是青少年次文化群體反抗的主要對象。Soo-yong Byun 等人（2012）在針對韓國升學體制所進行的研究中發現，雖然父母的社經背景通常會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取得，標準化的考試系統以及盛行的課後補習教育卻會壓抑和社會經濟背景緊密相關的「文化資本」的作用：出身自高社經背景的青少年從小積累的賦體文化資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甚至可能會為他們在考試系統中的成就取得帶來負面影響。儘管他們沒有進一步處理學科能力分群與地位認同的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多少暗示了盛行於東亞的標準化考試系統，某種程度上在青少年轉銜過程中的成就取得以及群體形成，帶來了有別於階級、族群等傳統社會分化機制的相對自主作用。台灣本土的青少年研究指出，即便歷經了十多年的教改，成績依舊是青少年社會生活中最被彰顯的價值，並且構成他們結識同儕最主要的依據（張明宜、吳齊殷 2013），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更是在與升學體制運作互動的過程中開展（邱珮雯 2008；崔治中 2012）。近期葉書宏（2015）針對台灣明星高中學生養成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的標準化考試體制讓成績好壞成為學生群體分化的主要原則；相較於有利西方青少年取得教育成就的文采、藝術能力，應對標準化試題的考試技巧更是台灣教育體制中「正當的」文化資本。

本文將就台灣升學體制下，依照成績對青少年社會地位與群體進行劃分的機制，以及在青少年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入學、考試、升級、畢業、升學等制度運作，來對上述的青少年次文化相關理

論，進行一帶入「教育經驗」要素的調整。我進一步拓展 Shildrick 與 MacDonald 的「生涯」概念的使用方式（Shildrick and MacDonald 2006; MacDonald and Shildrick 2007），指出探討青少年的日常文化參與和教育生涯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如何有助於分析青少年分別在休閒生活與升學領域採取特定行動策略的選擇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如何形塑台灣青少年獨特的文化參與以及集體升學實作樣態。藉由台灣升學體制下的明星高中學生「不惜犧牲課業，積極參與社團活動」的案例，本文從兩個不同層次來探討青少年文化活動參與和升學實作之間的相互關係：

- （一）強調考試排名、成績至上的升學體制以及「學校地位分化」作為催生明星高中興盛社團文化的主要社會機制：「能K能玩」的集體文化是在什麼樣的教育制度歷史脈絡中興起？什麼樣的制度結構條件讓明星高中學生更能投入到社團活動？這樣的集體傾向如何具體展現在學生校園生活實作，又如何促使學生採取特定的方式、策略進行社團活動？對於學生的教育經驗有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與功能？
- （二）學生「教育生涯」和「休閒生涯」兩個主要社會生活領域的交錯對於他們的升學轉銜過程帶來的影響：以升學考試為核心的教育生涯制度脈絡，如何形塑菁英學生集體共享的日常學習實作模式？此種由教育制度所形塑的集體傾向又如何影響他們社團活動參與策略？他們對於社團活動的投入又如何在升學的時間結構中影響他們考試升學的策略，並對升學體制的運作與再製帶來影響？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是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一部分。在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以及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這兩段期間，我藉由多重方式

蒐集質性資料。就高中社團與課外活動發展的歷史而言，我彙整了諸如報紙資料庫、相關雜誌、校刊、政府出版品，以及研究論文等來源資料，並且訪談包含 KG 高中在內的資深明星高中老師，嘗試釐清解嚴後學生校園文化轉變的歷史脈絡，以及學校升學制度與學生社團活動參與的關聯。

在民族誌的部份，我首先選定台北某前三志願男校「KG 高中熱門音樂社」（以下簡稱「KG 熱音社」）進行民族誌研究。該社主要研究對象共有 44 人，包括 100 學年度（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就讀二年級的 22 位成員，以及就讀一年級的 22 位成員。⁹選擇 KG 高中的原則基於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該校除了有著嚴格的入學門檻，校內許多類型的社團活動也享譽高中生的世界，校內更流傳一句諺語：「不入社團，猶如未入 KG 中」。在高中社團活動的世界中，該校許多類型社團也在跨校場域中佔有優勢地位，除了活動進行的相關技藝，在團體組織經營上，該校眾多社團經常成為他校比較、仿效的對象。儘管 KG 熱音社學生在社團活動上投入大量時間，該社畢業生多半能夠考取國內頂尖國立大學校系，每年最多僅有兩到三名成員落腳於私立大學（醫學系不在此列）。基於上述理由，該校可列為探討明星高中學生社團文化與升學體制的最適案例。就高中音樂性社團而言，該熱門音樂社長久以來亦被學生以及「業界」視為全台灣高中熱門音樂的「龍頭」。根據我所熟識的樂器行從業人員指出，KG 熱音社成員在音樂活動上的投入程度，一直是所有學校之中最高的。在我所接觸新成立的相關他校社團中，不少都會將他們視為社團活動經營、學習的模範；而在職業以及獨立音樂場域中，也有著為數眾多出自該社的知名音樂人，為該社在高中熱門音樂圈帶來一定程度的名聲與影響力。

我自 2011 學年度上學期 11 月進入 KG 熱音社。初期以「觀察參

9 這裡的人數是以高二後社團最後留下來的人數為主，不包含在升高二之前退出的前成員。

與」(observing participant)為主，隨著與他們的熟識，民族誌進行的模式也逐漸經由我的行動參與多了某種程度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成份，並搭配與學生、畢業生私下一對一或者二到三人的焦點團體訪談。民族誌的進行方式主要是從旁觀察團體課程、社團考試、自主練習等日常活動。過程中以筆記記錄田野資料，搭配錄音與影像記錄作為輔助。研究聚焦學生音樂品味與技藝的養成過程，以及這個過程如何和他們在正規課業上的學習實踐相互影響，從而共構為一個形塑他們整體學習認知以及自我認同的校園生活場域。

和諸如康輔、熱舞、吉他等多數熱門高中社團一樣，熱門音樂是個校際交流相當活躍的社團類型。除了社內日常運作模式的觀察，我也跟隨該社成員一同參與他校音樂性社團的公開演出活動，一方面觀察他們與其他學校的互動，同時建立與其他學校成員的聯繫管道，之後再與他們以及畢業生進行訪談，從事校際間的社團運作比較。訪談進行以與KG社互動最為頻繁的「六校」（傳統北聯前三志願男女校）成員開始，進一步擴及到中前段的學校。對於和KG中沒有太多互動的中後段學校，我則是透過音樂圈的人脈尋找畢業自中後段學校的音樂人，請他們牽線以便與在校就讀的社團學弟妹進行訪談。¹⁰ 藉由比較不同志願序學校的相同性質社團，本文嘗試勾勒高中音樂社團活動世界中，佔據不同場域位置的學生群體在進行活動上的策略差異，以及相互之間的權力關係與互動模式。本研究雖以台北作為主要田野地點，我也對台中、台南以及高雄的明星高中相關社團成員進行訪談，並透過學生與社團指導老師聯繫，嘗試從指導者的觀點來理解學生的社團活動進行過程，以及相關社團發展的歷史趨勢。

10 除了「六校」學生，本文也訪談 10 位在台北區來自不同等級、類型學校的熱音社成員，其中包含 4 位來自 3 所中前段公立高中，4 位來自 2 所中後段公立高中，一位來自前段公立高職，以及一位來自後段私立高中。訪談內容主要針對社團整體概況、成員參與程度、主要的音樂活動進行方式、與學校師長、家長的關係，以及社團活動與課業的關係。儘管這些訪談資料不夠用以做出和 KG 熱音社民族誌同樣程度的社團文化研究，卻已足夠透過對比的方式強化本文對明星高中社團的分析。

四、「能K能玩」：明星高中的社團文化

（一）教育改革與明星高中社團文化的興起

高中校園社團文化的興起，和解嚴後一連串教改運動與政策變革所引發的「中高等教育擴張」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波教改的發展脈絡中，除了在「教育鬆綁」的論述下訴求「教育解嚴、中立化」、「反體罰」（楊鎮宇 2008；李奉儒 2008），最重要的就是檢討數十年來日益嚴重的「升學主義」，特別是其所衍生出的一系列諸如「補習」、「能力分班」、「不正常教學」……等等扭曲學習本質的現象（如吳齊殷 2005；周祝瑛 2003；2008）。在一片檢討浪聲中，明星高中被視為造就上述現象的核心原因，其存在的正當性、相關入學制度也受質疑。從 1980 年代末開始，教育部所主導的「降低高中入學考試難度」政策，再加上大學校系增加連帶提升錄取名額、以及公立高中的擴增，漸次縮小了明星學校與他校之間的差距。¹¹ 部分私立學校以及新設公立高中在大學聯考中的優異表現，也讓明星學校在招生上的傳統優勢面臨挑戰。這類新興、或者後起，升學率表現優異的學校，成了在明星學校以外同樣能讓學生「考好試」的選擇。多元入學實施後，儘管學科成績依舊重要，卻不再是升學競爭的唯一指標，諸如社團活動、課外競賽……等等，皆成為對升學有利的項目。傳統公立明星學校相對自由開放的學風，以及因為歷史悠久而發展完備的社團活動，遂成為不論是校方招生或者是學生在日常脈絡中，用以展現特色的重要區別形式。

像是內湖高中的水球大戰、師大附中顛覆傳統的畢業典禮這類活動，經由媒體大肆報導後成為能夠凸顯學校「突破傳統、威權」的特色。此外，在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的脈絡下，高中不若大學系所可藉

11 如創立於 1988 年的內湖高中、1989 年的松山高中、1992 年的大同高中、1994 年的和平高中……等等。前述除了內湖高中，皆為將原本存在的國中改制為高級中學。

學科特色作為招生的區別策略；傳統明星高中豐富的社團活動、創意慶典……等等課外特色，逐漸成為學校在招生場合中用來打造校園生活「能K能玩」形象的要素，並引起各校學生在舉辦大型校園、社團活動方面的「軍備競賽」（馬培治等 2007）。¹² 在另一方面，過往被壓抑的青少年次文化也隨著消費社會興起在解嚴後發展（吳佳盈 2011；Ho 2003），搖滾樂團、街舞等文化，開始在與體制——家庭、學校——相互拉扯的情況下展開。研究指出，在後解嚴時期政治經濟秩序重整的脈絡中，上述那些不符合主流價值期待、容易與「壞學生」產生連結的次文化也成為政治人物結盟的對象，並逐漸被賦予正向意涵（蕭民岳 2008）。以搖滾樂次文化為例，從 1986 開始，過去專司替國民黨動員青少年、直到後來轉為專替青少年提供「正當休閒活動」¹³ 的救國團（Wu 1987），開始和山葉樂器共同舉辦「全國熱門音樂大賽」。對當時熱愛搖滾樂的青少年來說，這個比賽的出現代表了過去只能存在於「地下」場景的搖滾樂，首次有了能夠獲得制度獎勵認可的正式管道。隨著張雨生、趙傳等「原（地下）搖滾樂手」經由比賽的優異表現獲得唱片合約，並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後，全國熱音賽逐漸成為玩、聽團學生的指標性活動（羅悅全 1992），並進一步帶動校園熱音社的發展（簡妙如 2001）。

在此過程中，這些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次文化形式，也隨著解嚴後校園威權氛圍的解除，經由學生的組織動員進入升學型高中校園，透過學生社團的組織模式體制化。¹⁴ 自從舞禁在解嚴後被解除以來，學

12 根據曾在台北前三志願高中任教的資深教師F指出，特別自 1994 年台北市教育局仿照大學多元入學辦理公立高中推薦甄試以來，因為高中課程並不會因學校而有所不同，傳統明星學校開始透過強調課外特色進行招生宣傳。

13 救國團舉辦全國熱門音樂大賽的重要任務，是要透過活動的設立，引導喜好叛逆次文化的青少年進行「正當休閒活動」。在第二屆熱音大賽，當時的救國團主任李鍾桂在致詞中表示，「熱門流行音樂充滿活力、動感，正符合青年熱情奔放、開朗活潑的特性，希望這次比賽能滿足青少年朋友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的願望，倡導正當休閒活動」。

14 如建中熱音社於 1987 年創辦，為全台灣第一個以組樂團玩搖滾樂為主要活動的高中社團。隨後內湖高中（1991 年）、大同高中（1993 年）、北一女中（1995 年）與景美女中（1995 年）也陸續在 1990-1995 年間出現熱音社。即便在當時仍缺乏熱音社的校園中，組團玩熱門音樂也逐漸變成在校內吉他社受學生歡迎的強勢音樂活動類型。

生舞會的舉辦成為公立高中的重點學生活動，而像是吉他、熱音、熱舞這類表演性質社團，也逐漸在高中場域發展出舉辦大型成果發表，並在校際間較勁活動規模的校園文化。¹⁵ 校園活動舞台上的表演機會，也使得諸如熱音社、熱舞社……等等新興的青少年次文化社團，成為學生目光焦點所在。¹⁶ 許多可以在這些場合吸引眾人目光的相關技藝，成為同儕競爭的重點項目。在這樣的校園生活場域動態下，學生校園生活的核心問題不再只是過去時代重視的如何讀好書、考好試，而是如何在取得一定學業成就的同時，在社團活動也有秀異的表現。

（二）升學制度條件與明星高中校園文化形式

對「明星高中」學生而言，社團生活至少和課業生活同等重要，為了社團活動蹺課是常見現象。¹⁷ 葉書宏（2015）在明星高中學生養成過程的研究中，做出如下描述：

明星高中班級的實際狀況可能會讓許多外人直呼不敢相信。以建國中學為例，下課打牌的三五成群，在座位上唸書的只有三到五個……有些人在操場打球可能會打到上課一二十分鐘還沒進來。到了高二這種情況更為擴大，許多人成為社團幹部後經常半天不見人影，原來是去練習吉他、樂團、籌辦迎新、暑期營隊……在這樣的「教室秩序」下，建中當年的升學率依舊非常的好，同班那些不來上課的同學，最後依然考上了台大會計、法律、電機、醫學等系。（葉書宏 2015:

15 如前段學校熱音社經常互相比較成發的場地規模、「節目／紀念本」的印刷品質（從比較是否全彩印刷到是否用使用精裝裝訂）、燈光音響的規模與品質等。

16 一位 KG 高中資深教師 A 指出，約在 1990 年代後大型校園舞會、慶典以及表演性社團（吉他、熱音、熱舞）的「成果發表」（成發）文化在該校開始盛行，主導了學生的校園文化生活。2000 年後，舉辦大型成發的文化更是幾乎擴及到其他所有社團。該老師在訪談中提到：「連童軍社都要辦成發」。在現今的高中校園中，諸如舞會、成發種種校園慶典，已成為支配學生休閒生活的主要活動（見崔治中 2012），並且架構學生高中生涯的時間安排，環繞著二年級社團成發的舉辦形成了所謂「玩兩年，念一年」的校園社團次文化（A 老師訪談）。

17 在林雨潔（2010）與崔治中（2012）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

57)

我在 KG 高中觀察到同樣現象。學生曾向我展示一疊預先蓋好導師章的「請假條」，¹⁸ 這些假條能讓他們蹺課進行社團練習而不受處罰。對學生來說，為社團蹺課並非單純代表父母師長們眼中的「叛逆」，更是象徵他們為社團活動奉獻的重要標記，伴隨群體共享的社團參與態度：他們願意為社團成就犧牲念書時間。如同 Willis 在 *Learning to Labor* 所描繪的「小伙子們」透過一系列叛逆實作反抗學校教育控制，KG 高中學生將自身投入在「玩」的領域所表現出的叛逆舉動（蹺課、爬牆、玩社團玩到成績倒數、被當），可看成是他們對自身面臨的「教育制度條件」所採取的次文化回應。有所不同的是，在我研究中學生們的學業菁英的地位，讓他們更能藉由表面看似叛逆的舉動，展現自身的文化優越：經由社團活動投入以及叛逆實作，學生強調自己「不只會念書」，在「會玩」的層面也贏過「後段學校」學生，進而重新定義菁英學生的理想校園生活，削弱父母師長的控制權。KG 熱音社成員 J 如此描述：

社團裡面大部分的人都投入非常多的時間到活動上，甚至可以不管成績，很大一部分就是為了要去證明，我們不是只有像爸媽或者外界的人所想的，就是只會考試那樣。我們在那種一般人不會期待的領域，也會有其他學生沒辦法達到的表現。

在我的研究案例中，促使學生投入到前述叛逆次文化實作的因素並非「直接」來自於他們的階級經驗，而是台灣特殊的升學考試制度以及相應的社會分化機制。在台灣社會，經濟條件上所帶來的機會結

18 假條上的簽章並非由導師親自所核。據我在田野中獲得的資訊，通常是掌握假條管理的班級幹部有權力給其他同學蹺課上的「方便」。

構與社會階級分化固然是形塑不同背景群體文化差異的重要因素。然而，表面看似公平的標準化考試排名與學歷系統，卻在台灣青少年地位認同形塑上，導致「教育背景」成為比階級還重要的身分標記。在台灣社會，多數高中主要以「考試成績」作為招生的首要標準。在「教育功績主義」作為主導原則的情況下，儘管各校學生的組成來源實際上和階級以及區域差異有關，在學生群體形成以及主觀認同的層面上，「成績與學校等級差異」往往構成了學生區別彼此的首要社會差異，而學校的升學與校園治理策略也形塑學生參與次文化活動的機會結構。

KG 高中學生在休閒領域的投入和他們在教育場域中面臨的制度條件緊密相關。首先，長期累積的歷史地位、社會聲譽，以及歷屆優異的升學率表現，讓該校一直以來成為國中生升學的優先選擇，相對沒有招生競爭的壓力。在西方社會中，與弱勢青少年相比，白人中產階級青少年因具備受認可的社會地位與特質，能夠在進行叛逆次文化的同時，取得被權威角色（如父母、師長、執法者）容許的正當性（Wilkins 2008; Hollingworth 2015）。我在 KG 高中也發現同樣的社會邏輯：相較於其他學校，KG 高中校方對於學生「無傷大雅」的叛逆，以及社團活動的投入通常是「睜一支眼，閉一支眼」。如同該校的 O 老師所指出的：

明星高中學生比較容易花多一點時間在社團。就某種程度他們整體而言有一種榮譽感之外，導致他們即使在社團要維持一定高度、優勢，就會更努力去追求、精進自己的技巧。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他跟學校的大環境的制度有關係。應該說，其實明星高中大致上，他的教學反而是比較正常的，這所謂教學正常是說，他反而不會去凸顯只有主科的一些學習才是重點。那當然就是說，這也許是因為學生整體的升學表現已經有一定的保證，就說他反而會多了一些空間，比如說像藝能課、社會科，他會有一些發展的空間。

他們在休閒領域的投入，可類比到 Bourdieu 筆下的布爾喬亞階級，是如何透過看似與世俗利益保持距離的文化實作展現他們的優越性（Bourdieu 1984; 1998）。透過追求無實用價值的文化品味，Bourdieu 筆下的布爾喬亞階級能夠象徵性的表達對「經濟利益」的不屑一顧，進而展現自身的秀異；在我研究中的 KG 高中學生，則是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受認可的資本形式」（包含對考試有用的文化資本，以及優越學校地位的社會資本），佔據了高中教育場域中最優越的位置。在這個結構位置上，透過學業成就取得更進一步的優越地位的難度較高。¹⁹ 因此，透過與「課業、考試」無涉，甚至有所衝突的活動，來標示自身與其他學校學生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取得更進一步的秀異地位的主要策略。一位來自另一所明星高中的報導人甚至提到，「明星高中學生瘋社團，某種程度上更是可以向其他學校學生展示，我的腳上就算綁一堆重物，還是可以在升大學的表現跳得比你遠。」與他校同儕相比，這些學生具備較強的考試準備能力，加上過去社團學長們優異的升學表現，因而敢於在高三前大量投入社團活動。W 同學說明了支撐「玩兩年、唸一年」校園生活模式的集體意識基礎：

玩社團的普遍有這種迷思，就二年級隨他去，三年級再拼回來。這純粹就是一種自負的心態。就大家看，社團學長今年又考了三個台大電機，就會覺得，欸，我也會是那一個，覺得反正我已經比其他學校的強了，我最後一定拉得起來，我一定救得了。

相反地，非明星高中的學生在校園生活上面臨了雙重困境。他們

19 不少成員提及上高中後課業難度明顯提高，加上所有同學皆為基測成績優異的「強者」，因此無法像過去國中時期一樣能夠輕易名列前茅。在此情況下，「社團」或者其他休閒上的成就追求成為高中階段取得同儕地位的「暫時替代途徑」。而「很會玩」的特質，其實還能夠讓 KG 學生在高中階段同時與「只會念書的」（如嚴格管教的私立高中學生）以及「不會念書的」（非明星高中學生）他校同儕進行區別。

不僅沒有這種「被容忍叛逆的些許自由」，在社團活動的進行上也經常遭受校方干預。在我研究的田野中，中後段志願學校的熱音社成員皆向我表達了他們社團活動進行上因校方介入所面臨的挫折。儘管受干涉的程度不一，背後理由卻相當一致：學生被校方預設為必須善用高中三年苦讀，考上理想學校，讓學校繳出有利招生的榜單。舉例來說，位於新莊的某公立社區高中學生指出，他們入學時學校才剛從國中擴張為綜合社區高中，基於升學率考量，高一每天都要上課到晚上九點，而且學校會透過限制活動空間、經費等方式防止學生過度投入社團活動。相較明星高中學生，他們缺乏足夠的「考試資本」，需要注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彌補他們和明星高中學生之間在考試能力上的差距。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參與社團活動的程度遠不及明星高中學生。

這樣一種不同學校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關係到學生組成的社經背景差異。既有研究指出，出身自家庭社經背景條件較好的青少年，往往有更多機會進入較佳（特別是公立高中）的分流途徑（薛承泰 1996；林大森 2002），而台灣的公立明星高中更是有高比例的學生來自公教背景的家庭（駱明慶 2002；葉書宏 2015）。不虞匱乏的家庭背景不僅讓這些學生處在一個更有利的機會結構，有更多機會進入這些學校，同時也讓他們有足夠的資源與餘裕，進行社團活動的參與（多數社團活動都有一定經濟門檻，如社費、活動舉辦支出、樂器購買、找校外老師補習）。在我的研究中，仍有某些差異無法完全被階級條件所解釋。舉例來說，絕大多數的私立菁英高中學生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就讀這些學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考試成績未能達到明星高中的錄取標準；比起中段的公立高中，私立菁英高中嚴苛的教學環境讓他們的父母願意付出較高學費，以此尋求提升三年後子女考上菁英國立大學的可能性。在這樣的預期下，學生在校園中將面臨校方對於日常生活以及社團參與更嚴苛的管制，目的是讓他們在三年後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有能力與公立明星高中的學生一較高下，同時確保學校每年能提出足夠吸引家長的辦學績

效——優異的榜單。

在 KG 高中熱音社的田野中，也有少數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因為自身對於根植在「學校地位」的社團成員身分有強烈認同——「身為KG 熱音社的一份子」，他們和其他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一樣，對社團活動表現出高程度的投入與奉獻。舉例來說，KG 熱音社有個不成文的「傳統」：吉他手和貝斯手「必須」在升高二前購買一把高價位（至少兩萬元以上）的樂器，如此才配得上他們修練一年後所提昇的音樂實力。有位來自弱勢原住民家庭的C同學，基於自己身為社團成員的強烈認同，甚至動用了政府所發放的原住民子女教育補助去購買一把台幣三萬元的二手電吉他；此外，他的母親甚至向親戚借款以協助其社團活動花費。

並非所有來自弱勢階層的成員都願意為社團相關活動進行類似額度的花費。另一位本省籍，同樣來自弱勢家庭的Q同學，一方面選擇了相對較能省錢的方式參與熱音社活動——擔任不需購買樂器的「主唱」。而在積極參與必要活動²⁰的同時，他會避免出席一些他認為花費較多但沒那麼必要的活動（集體出遊、聚餐）。根據他本人的說法，基於身為社團一份子的強烈認同，其實他還是願意進行一些會超出家庭負擔能力的花費（如自費在校外學習歌唱技巧），並在高一高二期間投入大量時間在社團活動上。儘管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在 KG 熱音社佔少數，透過他們與私立菁英高中學生對比，說明了這類文化參與模式的差異，其實受到由「入學考試」、「排名」以及「學生篩選機制」所構成的不同學校地位階序之間的分化模式所形塑。²¹ 在下

20 通常必要活動為集體練習、參與他校演出活動、開會等。

21 本文並非否認階級在形塑青少年文化的重要性，而是強調，經由考試這樣一種強調功績主義的制度所取得的社會身分與地位，會在青少年群體以及認同形成的層次上，「掩飾」社會階級帶來的差異並產生社會後果。前文提到 KG 熱音社中來自弱勢家庭背景的成員，也會為了維持自身在「學業菁英的同儕群體」中的資格與認同，而投身到明顯有利於中產階級青少年的社團活動中，便是一個明顯例子。C同學也在訪談中指出，高中階段身為 KG 高中學生的身分，某種程度上能夠讓他因為產生菁英認同，進而為原有的弱勢族群認同帶來補償作用，他也因此願意投入到對自身而言成本負擔較重的熱音社活動中。上大學之後，即便他知道自己家境其實不太允許他過著和其他漢入中產階級好友們類似的次文化生活方式，高中以來累積的菁英次文化認同還是讓他會想辦法留在既有的交友圈當中。這些例子指出，階級或族群的確會影響青少年文化群

一節中我會進一步指出，這個由具體的升學考試制度所中介出的社會分化模式，如何形塑學生在文化生活方面特殊的目標追求策略，造就他們在社團活動層面上特殊參與模式。

五、KG 熱音社的青少年次文化

（一）不只是父母師長眼中的「課外活動」

對 KG 熱音社成員而言，投入大量時間到社團活動除了體現他們對於音樂的熱情與興趣，也能讓他們對父母、師長的教育期待與控制進行交涉，挑戰管教的界線。解嚴前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熱門音樂為一種在冷戰時期經由美軍駐台而傳遞到台灣的文化形式，在戒嚴時期保守的社會氛圍下，經常被台灣人視為一種不良的青少年次文化，參與者多屬於低教育成就的青少年。曾於 1970 年代經營知名現場音樂演出場所的陳先生回憶道：「一般高中生通常面臨較大的升學壓力，通常他們的爸媽不會允許他們去玩像搖滾樂這種看起來大有問題的活動。」即便在解嚴後的當代台灣社會，搖滾樂文化仍經常被媒體貼上諸如和「毒品、搖頭活動」有關的負面標籤，因而對多數父母來說，仍非令人放心的課外活動類型。因此，對該社成員來說，相較於參與其他看似「安全」的社團，加入熱音社代表一個象徵上更能展現叛逆、自主的選擇。

在實際活動參與上，熱音社屬於需要成員投入大量時間進行樂器練習以及活動參與的社團。在多數高中校園裡，熱音社經常被校方視為容易「危害學生課業的社團」。在田野中，不少來自各校의 報導人均提到，校方在新生入學時會介入其參與社團活動的選擇。舉例來說，C 女中的成員提到，校方會在剛開學時打電話給有意參與熱音社

體的形。然而，升學制度中的篩選與分流，以及相關的制度獎勵機制，也會為學生的學習、文化實作以及認同形成帶來特定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無法被化約為純粹是階級、性別或者族群等傳統機制造成的後果。這些機制會透過標籤與分類帶來「掩飾」其他社會差異造成的後果，讓學生們進而「誤認」（misrecognize），比起先天的社經背景差異，自己的地位更與自身的資質以及過去的努力（課業上、社團活動上）有關。

學生的家長，請他們勸說學生改為加入較不會影響課業的社團。在KG熱音社，不少父母對子女的熱音社活動通常抱持「部分容忍」的態度——在第一、二年採取忍讓、妥協的態度，期待他們的子女在高三「回歸正軌」專心準備學測、指考。然而，父母的容忍並非毫無界線，不少成員仍需以遮掩的方式維持社團活動投入。我在夜間田野中經常碰到學生需要在電話中向父母撒謊的情況：學生在放學後於社辦或者校外練團室進行樂器練習，卻在父母「查勤」的電話中謊稱自己留在學校或補習班的教室念書。部分成員面臨強度較高的干涉。舉例來說，W同學在二年級寒假於桃園舉辦的跨校活動中，直接被身為資深工程師的父親帶回台北家中，並且被強制必須退出社團，專心升大學的課業準備。在此種親子、師生的社會互動情境中，加入熱音社形同父母師長眼中「沉迷社團活動」的叛逆選擇，而非遵循他們的原先期待，也就是社團活動僅是完成學業責任後調劑身心的「課外活動」。

KG熱音社成員認為，他們和其他社團不同的關鍵在於，他們的社團活動才是「玩真的」。如G同學在田野中提到，「其他社團在段考前多半會暫停社團活動準備考試，但我們還是會繼續練琴、練團。」對KG熱音社學生而言，玩搖滾樂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經營的高門檻活動。除去白天課程，多數成員會在中午吃飯、休息，以及放學後聚集在社辦練習，直到晚上九點學校關閉社團區域的電力供應；週末多半時間社團成員也會聚集在社辦練習，或在校外音樂教室接受一對一課程及自主練習。²² 長期辛勤練習所累積的相關技術，讓他們認為自己是具有一定專業品味的音樂生產者，而多數同儕在他

22 在田野中，部分學生在社團活動練習的投入可類比到林文蘭（2013: 78）在原住民學生球員的校園生活中所觀察到的「課業擺一旁，練習擺中間」。舉例來說，筆者所接觸的某屆副社長，在高二下學期間為了學期末成果發表的演奏練習，幾乎整個學期沒背過書包到學校，也極少出現在教室，利用「白天上課時間」練習即將在成發演出的高難度歌曲。當然，我的研究個案和林文蘭的案例仍舊有極大差異。原住民學生球員是在弱勢的結構條件處境下，受到棒球活動中「看似」公平的訓練、獎勵體制所吸引，競逐對他們而言好像比課業領域更有機會的社會流動管道。在我的例子中，學生們已經透過升高中的考試在中學階段取得優越地位；課外活動的苦練對他們而言，是用來展現次文化秀異的途徑。

們眼中僅是被動的流行文化消費者。在音樂活動上，他們要求自己的現場演出必須要能複製歌曲錄音原作的所有細節，而樂器演奏所需的技術與知識，賦予了成員在音樂活動進行的「專業感」，使他們認為自己有別於大多數「高中生社團」。

熱音社成員普遍認為，其進行社團活動所呈現的各種特徵使他們與其他社團有所區別。然而，在課外領域也要追求優越表現的集體傾向，更反映出明星高中學生追求「能K能玩」的集體文化，而非熱音社所獨有。對於明星高中學生來說，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藉由次文化活動取得「能K能玩」的聲譽，並在同儕群體中獲得認可，與其課外生活模式是否和所面臨的教育期待衝突有關。此種「次文化秀異」（Thornton 1995）——透過挑戰主流價值的文化實作取得能夠與其他青少年同儕區別的優越性——地位取得的邏輯不僅適用於熱音社、熱舞社這類傳統上常被歸類到「愛玩」的社團活動領域。在田野中，就連「生物研究社」、「校刊社」、「詩社」等科學或藝文取向的社團，都會透過強調其社團活動和傳統教育期待衝突的程度，以提升招募新社員時的競爭力，期與傳統認知中「只會念書的好學生群體」區別。舉例而言，KG 高中生物研究社於新生招生時會強調，不是只有熱音、熱舞才是愛玩的社團，實際上該社有不少學長因為玩社團而被當掉不少主科。同樣地，校刊社和詩社長期以來亦存在所謂「秀公假單」的傳統：學生以社團運作需要為由從校方取得在某些時段不需上課的權利，此一權利時常被他們用來向其他校內、外學生展現自身能逾越規範卻免受責難的優越地位，並且取得「次文化秀異」。透過這些次文化實作，學生們試圖將原本容易被認為是書獃子型的學術性社團，轉化成在青少年文化場域更能吸引新成員的社群。

和 Hollingworth（2015）研究中白人中產菁英學生的「次文化秀異」類似，「能K能玩」的聲譽是菁英地位的產物，行動者必須先具備「受認可的資本」才能獲得此種社會獎勵。在台灣的教育場域中，青少年無法單憑課外成就獲得更廣泛的社會認可，只有已先透過優異成績取得「學業地位」的行動者才具備、並能夠運用「被承認的資

本」正當化自身在非課業領域的表現，進而獲得像是「能K能玩」這種表面看似鼓勵「多元成就」，本質卻仍預設「課業優先」的獎勵形式。此外，對於這些學生來說，前兩年透過社團成就所取得的獎勵只是暫時性的。學生必需在第三年經由學測或指考考取理想校系，才能夠持續保持「能K能玩」的社會聲譽，否則過去在非課業領域的投入反而會被他者——父母、師長與同儕——視為造成「學業失敗」的重要原因，²³ 並且對自我認同帶來負面後果（林雨潔 2011）。²⁴

（二）可測量強弱、比較排名的社團活動成就

追求「能K能玩」所需要的不單是像西方優勢青少年所體現的「認真讀書、認真玩」（study hard, play hard）（Hollingworth 2015），而是要在兩個領域皆取得可清楚看見、衡量的實際功績。換句話說，追求會玩又會讀書的象徵地位需要學生「讀得好、玩得好」（study well, play well）。在次文化層面上的實質表現顯示，菁英學生們熱衷於追求各類優越表現，即便是一般認為較不嚴肅、不具生產力的活動領域，他們也能超越其他青少年，有效地展現出他們對傳統父母教育期待的挑戰。此種次文化層面的集體需求，形成了KG熱音社成員偏好「可比較」技巧的音樂類型，因此重音屬樂風長久以來一直是學生

23 儘管何謂「學業失敗」對不同群體來說，有不同的定義，在KG高中有個明顯的共識是該校學生的正常表現至少要能夠考取「台清交成政」等頂尖大學以及「醫科」，否則容易被視為「不正常」的表現。舉例來說，田野中有位考上北部某中前段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的成員，曾在訪談中提到，他在高三發現成績拉不起來後，將「自己後來所考取的學校」設定為自我要求的最低門檻。儘管他的指考成績確實「順利達標」，他在該校就讀時，仍因為落後於其他多數高中同儕的表現而產生某種程度的「憤恨感」。

24 我在田野中約訪了五位沒有應屆考取「頂尖大學」的成員（其中有二位留級，二位考取中前段私立大學，一位考取中段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相關系所），他們多半表示學業挫敗的經驗，讓他們不願意在大學向他人提及自己過去就讀學校，甚至有人認為自己是「冒牌的KG學生」。舉例來說，有位成員在留級一年後，仍決定肄業先當兵。他指出，他在KG高中加入熱音社後很快發現自身對於音樂的熱愛，並把所有學習重心投入在樂器練習上。然而，課業上的荒廢與落後令他遭受同學冷落排擠、精神霸凌，並受到導師羞辱。這些經驗讓他認為自己是被這個高度競爭環境所排擠、切割的「失敗者」。他在留級一年後決定退學的同時，要求母親把所有的KG制服全部丟掉。因為對他來說，自己在課外領域努力，卻因為課業落後而不被承認的遭遇，是他求學過程中痛苦壓迫的來源。

成果發表的必要選項。

不少以音樂為主題的社會學與文化研究文獻指出，在搖滾樂發展的歷史脈絡中，重金屬音樂在樂手、樂迷組成的人口特質上一直是個由男性主導的音樂類型，並流行於低社會經濟背景、教育成就的聽眾群體中（Bennett 2001; Shuker 1994; Breen 1991）。在 Willis（1978）對於 1970 年代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品味研究中，指出流行於當時的「前衛藝術搖滾」因包含大量符合中產階級品味的傳統學院派音樂元素，故成為社會經濟地位與教育水平較高（多具大學學歷）的「嬉皮族」所喜好的音樂形式。重金屬音樂相關的品味研究文獻則指出，在這個音樂類型的主要場域中，樂手或樂迷多半出身自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群體，此類風格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徵通常和音樂類型中經常強調的「陽剛氣質」有密切關連（Murdock and McCron 1976; Macan 1997）。

台灣的青少年音樂文化呈現出不同的圖像。在西方受到工人階級、低教育成就聽眾與樂手喜愛的重金屬，在台灣的高中熱音圈則受到明星高中學生喜愛。和西方青少年音樂文化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重金屬音樂經常強調的「陽剛氣質」並非台灣明星高中熱音社成員關注的最主要焦點。對學生來說，這些音樂類型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在於，它們能夠讓學生學習到「嚴肅的音樂知識」與「最強的技巧」。在技藝學習的知識、技術層面，音樂競爭需要明確的衡量標準；多元、開放的評價標準無法讓學生在同儕群體間區分優勝劣敗。這一種技術上的需求體現在學生展演曲目的選擇模式上：能夠讓學生「求進步、分強弱」的歌曲類型通常是學生成果發表的首要選擇。如此一來，重視「精湛演奏技藝」（instrumental virtuosity）的重金屬成為最適合的選項。²⁵ 在社團裡，學長鮮少鼓勵新生練習不強調常規技巧的曲目，²⁶ 因為這類曲目被認為衡量標準過於多元，難以讓學生在

25 舉例來說，芬蘭的「力量金屬」（power metal）樂團——騰雲樂團（Stratovarius）的演奏曲 Stratosphere，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是 KG 熱音社吉他手的標準必練曲。在我進行田野的期間，社團吉他手甚至 Bass 手多半會把該曲列為日常練習手感的素材。原曲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Z47_qMqYA。

26 特別是不強調樂器獨奏的龐克搖滾（punk）。

彈奏技巧上精益求精，而最終的結果是無助於新生在技巧上「求進步」。

父母師長普遍認為社團活動是學生完成課業責任後稍事調劑身心的課外活動。然而，經由努力練習取得精湛彈奏技巧的成就，讓 KG 熱音社成員認為他們的活動比一般高中社團更具專業性。²⁷ 這個獨特的次文化實作模式——經由數個特定、可衡量的標準而取得超越其他類型學生的成就——不僅能夠「有效地」讓成員們認為他們挑戰了像是「明星高中學生就是要好好專心念書、考好大學」的傳統教育期待，並且也進一步讓他們處於一個看似「雙贏」的狀態：除了念書，他們還能在非課業考試的領域中，達成其他學業表現較次之學生所無法取得的成就。²⁸ KG 社團的 L 同學便在訪談中用驕傲的口吻提到他們社團如何與其他「一般高中熱音社」不同：

我們做歌不是為了好聽，而是因為歌裡面有專業的技巧。我

27 本文所探討的音樂操作模式，某種程度上符合音樂社會學者 Simon Frith 與 Angela McRobbie (1990) 所指出的，能夠讓男性演奏者展現陽剛氣質的「陽性搖滾」(cock rock)。然而，根據我長年在高中熱門音樂場域的觀察，儘管這些強調炫技的演奏技巧具有強烈的性別意涵，他們同時也被轉譯為菁英學生地位展演的文化工具箱(tool kit) (Swidler 1986)，用以和非菁英學生的音樂實作區別。一個明顯的指標是，明星女子高中熱音社在過去十幾年的發展中也逐漸變得與男校同樣強調技術競爭，此一轉變與台北市傳統明星高中熱音社組成跨校社團聯盟的組織形成過程有緊密關係。我在田野研究過程中追查到，大約自 2004 年開始，包含 KG 高中熱音社在內的台北傳統前三志願熱音社，開始組成一同舉辦聯合演出的跨校聯盟。在成立的前幾年間，KG 高中熱音社成員認為聯盟中的一個女校熱音社成員演奏實力「太弱」，並且社團內部運作缺乏嚴格的學姊學妹制，導致社團成員學習態度不佳，因此計畫將該社從聯盟中除名。然而，這個計畫因遭到其他明星高中熱音社強烈反對而終止。經過這個事件，該女校熱音社為了要能夠保住菁英聯盟中的成員資格，便開始重視社團內精湛技巧的訓練，新成員需要經由學期社團樂器考試才能保留社員資格，並開始採取嚴苛的學姊學妹階序作為組織治理的主要框架。我在訪談中也發現，學校地位低的女性青少年在音樂進行的內容上較不會執著於技術，會更全面的重視玩樂團的其他面向。我的解讀是，在學業菁英的青少年次文化圈，「學校地位」是群體形成、認同形塑的主要機制，性別差異在此社會過程被學業菁英的社會身分「掩飾」，讓菁英青少年在搖滾樂活動的進行上也呈現出高度競爭性；而在非菁英的群體中，搖滾樂活動上的性別差異則因為缺乏學業地位因素的介入而較為顯著。礙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在此做出太深入的分析，我將在其他著作中針對性別、階級與學校地位的交織(intersectionality)做更詳盡的討論。

28 朱夢慈(2017: 22)在北部中後段社區高中熱音社所進行的研究可作為對比。她發現這些學生「多翻唱演奏技術難度較低的歌曲，其中又以中文流行搖滾、日文流行搖滾和日本動漫歌曲最為常見」。

們通常會選擇超越高中生水準的歌來翻唱。簡單來說，我們社團不只是那種爸媽老師眼中的課外活動，而是你要真的很認真花時間練習才能產生成果的專業活動。

六、社團活動與升學競爭： 學生的教育生涯與休閒生涯

學生進行社團活動的方式和他們面對升學考試的學習策略高度相似。葉書宏（2015）在明星高中學生養成過程的研究中發現，相關考試能力積累的條件在於養成能對應「標準化考試」的「讀書慣習」（studying habitus）。這個學習稟性由青少年在家庭教養與教育機構這兩個領域所構成的學習過程脈絡中養成，主要以「限制娛樂」、「重複的機械練習」、「取得快速精準回答標準化試題的能力」、「挑戰高難度測驗題」等學習實作為核心。葉書宏（2015）發現養成這類慣習所需的特殊文化資本與 Bourdieu 理論意義下的「品味、文采能力」有所不同，學生在教育社會化的過程中所積累的是對應標準化考試的能力。在實作的層面上，學生需在家中或補習班進行超前進度的預習，並且從中養成主動複習、勤寫模擬試題的習慣，從而能在重要考試中迅速且精確的找到「標準答案」。更重要的是，學生們需要在這樣的過程中養成願意主動追求這些目標的傾向，習慣追求能夠讓自己與平庸學生區別的「解難題能力」，從而讓這些稟性成為他們讀書慣習的一部分。

在 KG 熱音社，前述常見的考試準備策略清楚體現在學生樂器學習的過程中。首先，和透過追求解難題的能力尋求區別的傾向類似，學生在樂器的練習上偏好追求精湛的演奏技藝，進而和「一般高中生的演奏水準」區別。新生們必須經由社團集體訓練機制轉化成甘願主動練習的成員，聚焦在固定的練習範圍——特定的技巧、音階形式、曲目，才能逐步積累有利於他們取得優越地位的次文化資本。在這個

社會過程中，常見於台灣菁英學生準備考試的「專注、自制」能力，被認為是讓他們進行社團活動時，也能取得和考試競爭同樣成就的重要特質。某屆 KG 熱音社前社長 V 同學，認為 KG 學生在國中階段為準備考試所訓練出的自制能力，實和他們社團在高中熱門音樂場域的技術優越地位密切相關：

我會覺得我們考試和社團都比較強，不是因為我們特別聰明。對我們來說練琴跟念書其實很像。我覺得主要差別是我們很容易專注在我們想做的事情上。我在國中的時候，我準備考試複習就是可以連續在書桌前坐好幾個小時，我只是用同樣的方式在彈樂器。

專營各高中熱音社團教學的音樂教室負責人 K 先生，也在訪談中強調明星高中學生在進行熱音社活動的「優勢」特質：

我們辦活動有看一些私立學校，表演過程就是一直鬧一直鬧。他們玩音樂表現不好，其實和成績不好的原因一樣，就是做事情沒辦法專注。一中和女中的學生也會嬉鬧，但玩一玩可能就會從袋子拿出數學英文，可以坐在旁邊看他的書。之前有個媽媽他女兒是女中熱音社，兒子是二中吉他社，哥哥在上課一直練，女兒每天揹琴，有時候帶書包帶衣服，琴又那麼重，每天背來背去也不會抱怨，常常加課常常練習，也不是只有社課，你就是看也看得出來成績好，在做一件事情的態度；那成績不好的做事態度的態度嘛就是……。

這個傾向和台灣中產階級家庭父母在面對升學體制時，強調磨練的教養實作有很大的關聯（藍佩嘉 2014）。在校園生活的層面上，這些集體學習傾向還關係到一個由連續不斷的重要升學制度事件所構成的機會結構，並且經由一次次的獎勵機制所驅動——特別是校內以及

升學考試。前文所提到的「生涯」概念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此種由集體所共享的學習傾向如何在特定的社會過程脈絡中被形塑、驅動，並且進一步體現在青少年日常活動的選擇決策模式中。

MacDonald 與 Shildrick（2007）在東北英格蘭傳統工業區所進行的青少年轉銜與街角次文化參與的研究中，使用「休閒生涯」概念來指涉青少年從事閒暇、娛樂活動的主要模式，以及這個模式對於青少年在其他方面的生涯轉銜過程的影響。他們發現，長時間的逃學以及持續性的參與街頭同儕團體的「休閒生涯」，使部分街頭青少年成員的日常生活被框架在一個和主流社會參與路徑——如升學、進入一般職場——有所衝突的社會網絡中。如此一來，他們更容易在成年階段涉入經常性的藥物使用以及竊盜等犯罪行為，從而為他們的生涯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延續弱勢處境。他們進一步提出一般化的命題：青少年轉銜過程中多重面向的生涯，其彼此間的「相互依賴」。特別是進入成年之前的階段，青少年所身處的休閒生涯，以及同儕群體的集體慣習（Bourdieu 1990）往往在他們的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因此休閒與其他生涯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對青少年的選擇、決策模式帶來的影響是這個階段的分析重點：

如果沒有分析青少年的休閒生涯如何形塑特定的次文化、同儕認同，以及相應的價值系統與生活方式，我們很難完整地解釋他們在下個階段的處境……。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去掌握他們在其他面向——教育、家庭、職業——的轉銜過程，我們也很難理解在他們休閒生涯的發展過程中，於文化認同以及同儕網絡參與所呈現出的特殊樣貌。（MacDonald and Shildrick 2007: 350）

這個架構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 KG 高中學生社團參與的特殊模式，也能夠進一步解釋他們在升學實作上的策略選擇。以下我將會透過學生的「休閒生涯」與「教育生涯」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來分析他們在

兩個領域的實作策略，以及這項關係對升學體制的意涵。

（一）教育生涯對於社團休閒生涯的形塑

社團活動是台灣高中青少年同儕文化參與的主要社會網絡機制，活動的參與被架構在「高中升大學」的教育生涯中。教育生涯的進展主要圍繞在下列幾個重要教育制度事件：入學、上課、段考、升級、參與大學入學考試（學測、指考）、以及畢業、升大學，這些事件直接形塑了青少年社團活動參與的路徑以及實作策略。台灣的大學招生主要以學測與指考成績做為篩選學生的機制；即便近年越來越多系所申請入學的招生會參考平時成績以及申請文件，「學測成績」依然是最重要的篩選標準。在此制度脈絡下，學生必須在二年級的社團成果發表結束後「歸隊」成為專心複習的考生。如此一來，實際的社團參與其實只有不到兩年時間。

受到「贏過他校學生」的集體目標驅動，社團活動進行的核心任務在於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學習高難度的活動技藝。社團主要活動事件的進行需配合學期行事曆，在時間上受課業學習與考試安排所影響。以 KG 熱音社為例，每個學年度社團會舉辦四個主要演出活動，活動進行時間的安排通常以學校的學期開始、結束，以及考試時程為主要依據。這些活動分別為：學年初的迎新演出、寒假期間的跨校聯展、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後的跨校聯展、以及學年末期末考前的年度成果發表。

在升大學的教育生涯過程中，學生們必須在上課、補習、預複習課業、考試準備、以及社團活動幾個項目之間進行時間分配。有限的表演機會與可供支配的時間構成了學生進行社團活動的機會結構；基於必須在高二一整年的數次表演機會中，達成一定社團活動成就的前提下，學生有必要將能夠投注在社團活動的時間做最有效配置。如此一來，他們在活動的進行上更傾向選擇那些能夠為他們的集體聲譽帶來高報酬的活動腳本——那些能讓他們看起來比其他學校學生「強」的曲目。某任前社長 T 對 KG 社團的活動進行方式做了如下評論：

「高中的時候大家喜歡練習技術很難的曲目，主要因為這是一個在短時間內可以讓我們看起來比其他學校強很多的捷徑。」

在課業學習的領域，學生多半專注在考試科目；相同的制度脈絡鼓勵學生採用類似準備考試的方式做為社團活動進行的主要策略——把有限時間花在被獎勵機制所認可的實作類型。每一次社團活動的發表腳本都有清楚的練習、準備範圍，早早開始進行重複、機械式的練習則是取得活動成就的有效策略。

每當新成員加入社團，二年級的學長首先會強調「超前進度」的重要性。新生被要求盡早選擇未來成果發表演出的曲目，並且把時間集中重複練習這些音樂腳本，直到公開演出為止。這個練習體制體現了他們在課業學習上的「預習」模式：盡早針對已知的範圍進行準備工作，並且只專注在這些對於取得制度認可的成就、獎勵有利的項目，搭配近乎機械重複的方式進行無止盡的練習。D 同學對這個模式做出如下描述：

D：接了社長之後就開始認真的在找，我要做什麼歌，認真的找成發、六校、迎新要做的歌。

我：那時候就找成發的歌，會不會太早了一點，還有一年耶。

D：高一下快結束的時候，學長就說，成發的歌現在就要開始練了阿，其他學校某人練某首很難的歌練了半年、一年之類的。他們一直強調說你們要早點開始想，你們成發要做什麼歌，什麼寒假就要開始練啊，這一類的。

在升學考試準備過程中，「補習」和「預習」是兩個互相依存的實作策略。同樣地，這樣的策略體現在學生社團活動的進行過程。二年級成員「規定」新生入社後一定要花費額外的金錢與時間，去找坊間知名的音樂教室老師學習演奏技巧，如此才能「贏在起跑點上」。以下摘錄一段二年級成員和一年級成員間有關「補音樂」必要性的討

論：

一年級成員：社團有社課，這樣我們還要花錢出去找老師嗎？

二年級成員甲：先確定你要學的樂器以後，就可以去找老師了，不然進度會跟別人差滿多的。

二年級成員乙：都要去找老師，不管哪個樂器都一樣。越早去找對你們幫助越大，這樣你們才能贏在起跑點上。

「贏在起跑點上」是亞洲華語區域中常見的教育論述，用於強調在教學／學習上「超前學校進度」的重要性，預設提早開始準備的學生能夠在升學考試的制度系統中取得優勢地位以考取頂尖校系。這個論述經常被升學補習班當作招生宣傳口號，強調學生學習進度會由熟稔考試準備技巧的專業名師把關。對學生來說，知名的音樂教室老師無異於補教名師，他們能夠確保學生在「正確的學習軌道上」，並且傳授「致勝技巧」，從而在競爭中脫穎而出。H 同學說明了他在一年級的時候，如何因為受到一位他校同年級學生在樂器彈奏上的精湛表現所刺激，因而發憤尋找知名職業樂手學習，取得能夠贏過對方的技術資本（technical capital）（林文源、陳晉熙 2012）：

我那時候跑去看 GC 熱音社學生練習。他們在練一首技巧非常難的歌，然後那個樂手的 slap 技巧，²⁹ 讓我覺得好厲害，明明同樣是高一。我那時候就開始想說，我一定要做改變。我覺得以前都用錯的方式在練習，跟到不對的老師，聽到不對的音樂。我後來馬上去搜尋貝斯 slap 很強的老師。第一堂課的時候，我跟老師說，到我成果發表前這一年，我只想學

29 該技巧的聲響特點則能夠讓原本容易被忽略的 Bass 手成為注目焦點，學習上的高技術門檻特質也讓該技巧成為鑒別樂手強弱程度的重要技術資本。

slap，我要在每個禮拜的課堂上學一個新的 slap 樂句這樣。

H 同學在尋找專業樂器老師上近乎直覺反應的決定，體現了他在經歷教育生涯過程中所形塑的學習慣習。這樣一種由台灣升學體制中的一連串制度事件所形塑的稟性（disposition），體現在 H 同學對於需要在特定的時間進程（高二一整年）內，就某個被制度與社群認可為高難度的活動項目上贏過對手的感知（perception）。前述的「尋找名師」、「專注在對獲取聲譽有用的技術資本」，更是呈現了教育生涯過程中常見的升學準備策略在社團活動領域中的複製。在「高中升大學」的轉銜過程中，社團活動領域成為由考試延伸而出的地位競爭與身分展演的外延戰場；經由集體共享的制度慣習的中介，學生不論在課業還是社團活動領域都利用相同策略來追求休閒成就與同儕地位。

（二）社團活動如何強化升學競爭：休閒生涯對於教育生涯的影響

學生的休閒生涯並非只是被動地受教育生涯影響，社團活動參與模式也回頭影響課業學習的路徑：高一高二於社團活動投入大量時間，學生在第三年更需要以工具化的策略準備升學考試，強化機械性試題練習與補習強度。在高二升高三之際，社團成員經歷角色轉換過程：從社團核心成員轉變為「考生」。「年度成果發表」是這個轉折過程的樞紐，在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戮力將自身在社團活動領域所累積的實力在觀眾面前展現，把累積的文化、技術資本轉化為個人與群體的聲譽，強化集體共享的社會資本。活動結束後，學生卸下社團核心成員身分；隨著「選擇下屆幹部」、「交接」、「送舊」等儀式，二年級成員在進入升高三的暑假前自社團「退休」，將社團運作經營的權力與責任交付給低年級成員。這一系列儀式過程將他們「帶回」教育生涯的正軌：集中全力準備大學入學考試，淡出社團活動。

角色轉換過程中，最關鍵的時刻發生在升高三前的年度成果發

表。在 KG 熱音社成果發表最後演出節目結束後，所有成員上台分享過去兩年社團參與的感言。感言的進行伴隨著明顯可見的像是集體流淚、泣訴等情緒表現，內容的主軸是他們過去兩年對社團所付出的努力，並且對父母表達感謝甚至懺悔。在感言的尾端，負責發表感言的社團幹部帶領全員對觀眾做出如下宣示：「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成發，我們已經一起完成了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一起上台大！」

「高一高二玩社團」的校園生活安排是介入學生教育生涯的重要機制。學生在休閒生涯過程中「犧牲」前兩年的讀書時間，因而必須在高三窮盡一切有效率的方式準備學測、指考。前兩年玩的越兇，意味他們在最後一年將面臨更大的考試壓力，進行密度更高的考試準備與填鴨學習。然而，正因他們前兩年投入社團活動、在休閒活動領域取得的高成就地位，讓他們在最後一年更「心甘情願」回到升學競爭的正軌。我在田野中觀察到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KG 熱音社半數以上的成員於成果發表結束後一週內，集體將髮型改為平頭，象徵自己已經卸下社團成員身分，全心投入考試複習以考取理想大學校系的決心。根據我在 KG 校園內的觀察，在高二升上高三之際，剃平頭的學生不只有熱音社的學生。擔任社團幹部的 T 同學向我指出，基本上在 KG 高中裡，很大一部分認真玩社團的學生都會在社團成果發表結束後集體剃平頭，進行同樣的儀式性宣示。

高二到高三：從社團到補習班

高強度的補習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首要策略，學生下課後的主要活動場所由「社辦」變為「補習班」。在 KG 成果發表結束後，副社長 Y 同學隨即剃了平頭，並且報名台北某間知名補習班的「全科衝刺班」。於暑假期間，他每天早上八點向補習班報到，待到晚上十點回家。

「升學補習班」對這個特殊的校園生活文化，以及教育生涯的形塑扮演重要角色。我在田野中發現，升學補習業者主動介入學生社團

活動，藉活動贊助、成員集體報名優待等商業策略進行招生競爭。舉例來說，有知名業者主打幫助學生達成「能K能玩」的口號作為招攬學生的主軸；在榜單上強調考取頂尖大學的考生的社團經歷，是常見宣傳手法。於田野中，我常見到補習班業者派出班內「輔導老師」——經常是年輕、面容姣好的異性——和社團成員密切接觸。一方面藉由頻繁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提供活動舉辦所需的相關協助，透過社團這樣一個「群體聚集機制」來和菁英學生群體建立關係。另一方面，補習班還透過「學費折扣退款優惠」直接對學生進行金錢支援。我在 2012 年暑假注意到 KG 熱音社成員固定在每週一下午集體缺席社團活動。學生告訴我，全體社員以社團名義，每人至某補習班繳交伍佰元做為暑期試聽高二物理課程的費用；試聽期間成員只要全勤出席，每個成員將可從補習班拿回一千元的「退款」，做為社團活動費用。

在此情況下，補習班和學生之間形成共謀關係：補習班金援學生的作法，某種程度上近似讓學生收取「回扣」的概念。對學生來說，向父母索取金錢報名補習課程，遠比繳交社費或其他相關花費更具正當性；然而，父母通常不知道提供給子女的補習費中，有部分會被補習班重新分配給社團供學生進行活動。因此，補習在這樣的脈絡下也成為學生用於輔助社團活動進行的手段：向父母要錢補習，之後再從這些補習費收取用來舉辦社團活動的回扣。

這項表面上看似虧本的招生策略背後的主要作用在於，讓「補習班」成為學生社團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吸引更多學生向父母索取金錢花費於補習業者在現今體制下的重點商品：衝刺學測、指考的高三「全科班」。以北部某知名補習業者推出的社團優惠方案為例，倘若高二期間該社團有五位以上預先報名高三「全科班」，補習班將提供社團一定金額的成發贊助費用。

根據學生指出，只要預先繳交高三全科班費用，高二期間即可至該補習班參加與學測、指考科目有關的課程。在社團成果發表前，學生多半忙於準備表演而犧牲補習課程的參與。儘管補習班設有點名制

度，負責對社團招生的輔導老師通常會在成發前「掩護」這些蹺課學生，不會告知家長有關他們子女的逃課行為，以此營造出補習班支持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形象。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學生在成發後必須回到準備升學的正軌，於每日放學後以及週末，前往補習班接受針對學測、指考所設計、整理好的套裝考試能力訓練。在前述「高一高二拼社團，高三拼學測指考」的雙軌生涯安排路徑中，補習班扮演的角色為有效率地供給學生於學測、指考取得高分的考試技能。我在田野中曾聽聞該補習班輔導老師提到，學生、家長真正在意的是考試、上好學校，並非「念書」本身；而該補習班所做的也就是，幫助學生「高一高二好好玩社團，高三考上好學校」。

學生們認為自己在社團活動的高度投入，與相關的叛逆行為，能夠挑戰父母輩的傳統教育期待，並重新定義菁英學生的理想生活型態。然而，上面的民族誌資料告訴我們，這一系列的校園文化其實發揮了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既有升學競爭邏輯，再製考試體制的意識型態作用。他們的次文化活動體現了 *Learning to Labor* 一書中的「反學校文化」的部份特質。一方面，KG 熱音社成員藉由犧牲課業展現出對於社團活動的投入，以及一系列伴隨而來的叛逆行為，發揮了如同反學校文化中「局部看穿」（partial penetration）的社會功能：在「玩兩年，唸一年」的教育生涯中，學生們藉由他們所共享的獨特文化形式，體察到自身所面臨的升學條件處境，從而同時在課業與文化生活的領域進行策略性的時間安排。Willis 的小伙子們能夠在「學校教育與文憑」和「追求樂趣」兩者間進行「機會成本」的評估（Willis 1981: 126），KG 熱音社的成員則是藉由自身處於公立菁英高中所享有的各種教育、文化資源，評估自身在教育場域流動過程中的客觀條件：學生們不需要遵照學校所安排的進度進行學習，「最後一年再拼就可以了」，透過文化與升學實作來追求玩樂以及課業成就的「極大化」。藉由前述的集體文化實作，他們與符合傳統教育期待所定義的好學生進行區別，打造獨特的校園文化以及對學校、社團身分的集體認同，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象徵地位空間。

有所不同的是，優越的社會位置為 KG 熱音社成員的次文化活動帶來相當不同的後果。雖然 Willis 的小伙子們能透過反學校文化確立自身在校園中的同儕地位，弱勢背景讓他們只能侷限在次文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就，無法在次文化場域外的社會生活獲得任何好處。甚至，他們會因為這些次文化參與的經驗，延續自身的弱勢處境——如持續進行工人階級的工作。對比之下，KG 熱音社成員其實更像是 Hollingworth (2015) 研究中的白人菁英「哈草族」：一方面，他們能藉由叛逆的次文化與休閒成就，與其他青少年同儕進行區別，取得優越的同儕地位；另一方面，他們所具備的高文化資本與受認可的社會地位，則讓他們的叛逆次文化只需要面臨「有限的負擔」(limited liability)，³⁰並藉由休閒領域的成就獲得「能 K 能玩」的社會聲譽，於次文化的場域中再製社會不平等。

儘管此種「次文化秀異」為他們帶來了前述的雙重利益，其與反學校文化同樣有著意識型態效應的限制。他們投入社團活動的方式，讓他們誤以為自己脫離了升學體制的控制，並且進一步阻礙他們去辨識既有升學制度運作的核心機制：由考試、線性排名與學校等級階序所構成的競爭與身分地位分配系統。正是這個機制，讓學生不論在升學考試、社團活動參與，都心甘情願地投入大量時間進行成就與地位的競爭。在社會實作的層次，通過大量時間、精神投入所積累的資本，以及成就地位的取得，是讓他們願意持續不斷重複這些文化實作的關鍵。在這個社會過程中，他們就如同 Bourdieu 所描述的，是「在場域的遊戲中適應良好，但也因為太過於擅長遊戲的進行，從而無法從遊戲中遁逃的場域代理人 (agent)。」(Bourdieu 1998: 79) 因此，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動態中，高中校園的學生社團實際上促進了考試導向升學競爭邏輯的修正與再製。經由學生在社團活動的投入，考

30 通常參與次文化會因為常涉及與主流價值衝突的活動或行為，易對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Wilkins (2008) 使用「有限的負擔」(limited liability) 概念，說明白人中產青少年如何因為其優勢的社會背景，而能夠在參與挑戰主流價值的次文化的同時，不會如弱勢青少年（如黑人、工人階級）的次文化活動一樣，對未來造成嚴重影響。

試教育的競爭邏輯一方面經由「高一高二玩社團，高三歸隊拼學測指考」的校園生活，年復一年地複製到每屆學生的教育經驗過程中；另一方面，此一邏輯也經由社團活動，橫向延伸到次文化活動的領域，學生們沿著學校地位的區別競逐休閒領域的秀異地位，強化了由入學考試成績所劃定的學校地位階序之區別。

七、結論

青少年如何藉由次文化活動適應他們在社會地位取得過程中的處境，長期以來一直是相關研究的焦點。不論是芝加哥學派的偏差次文化，或是伯明罕學派所勾勒的工人階級青少年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次文化抵抗，這些容易被正常社會視為叛逆、甚至偏差的次文化實作，都是青少年在經驗社會流動過程中採取的因應策略。這些策略不僅有助於打造、凝聚他們的集體認同意識，也經由他們的集體社會實作，對他們所面對的體制帶來實質影響。

本文從批判的視野承繼這條發展路線。我首先依循台灣在地隨升學體制帶來的成績、學校等級分化對相關理論進行調整，並以 KG 高中熱音社做為主要個案，分析台灣公立菁英高中學生的社團文化與教育經驗之間的關聯。我也進一步探討，這些菁英學生的優越社會位置，如何讓他們的次文化活動產生不同的社會意義、功能與後果。在多數社團活動領域中，明星高中學生不論在投入程度以及「可比較」的表現上，都明顯高於其他類型學校的學生。這個現象關聯到 1980 年代末隨著民主化、教改帶來的教育政策改變，在升學型高中校園所興起的追求「能K能玩」的次文化氛圍，以及相應的升學制度脈絡。藉由將「教育經驗」的要素帶入青少年次文化理論，我分析 KG 熱音社的學生如何透過追求「玩樂成就」，一方面對父母、師長的教育控制進行交涉，挑戰管教界線，並爭取時間使用的自主權；一方面也凝聚集體認同，強化自身與排名較差學校學生的區隔。透過追求次文化領域的優越地位，這些學業菁英青少年展現自己除了很會念書，「玩

樂」方面的成就也「贏」過其他學校學生，在社團活動的領域中鞏固自己經由標準化考試獲得的優越地位，強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的地位不平等。

不同於盛行西方菁英學校中的 *study hard*, *play hard* 文化，在台灣重視考試的升學體制下所催生出的菁英次文化，重視的更是 *study well*, *play well*。KG 熱音社學生在教育場域中獨特的結構位置特性，為他們帶來了不管在學業以及休閒層面，都必須追求優於他人表現的需求。在這樣的體制中，不論是課業或者休閒文化參與，學生都必須經由可衡量、比較的成就表現，分別在課業和休閒的領域取得、維繫自身的秀異。這個集體文化需求，讓他們對音樂社團活動成就的定義無異於考試成就的取得：學生傾向選擇能讓他們表現「可比較、量化」的演奏技巧的音樂類型，排除更具開放性的學習方式。我在論文中延伸了青少年次文化與轉銜研究中的「生涯」概念（Becker 1963; MacDonald and Shildrick 2007），說明學生在課業與休閒的時間投入與策略選擇，如何被升學過程中兩個主要領域的制度安排限制：一是由學校考試、升級、學測指考等關鍵制度所構成的「教育生涯」，另一則是由社團活動事件所構成的「休閒生涯」。在這兩個領域交錯構成的時間安排結構中，學生在課業及休閒活動都傾向以工具主義、速成的方式追求成就以穩固菁英地位，讓升學考試中的競爭邏輯與填鴨學習，複製到日常文化實踐與課業學習的領域中。

表面上看來，明星高中學生有更多自由和時間在「玩」的層面發展，掙脫了傳統升學競爭的束縛。但研究發現指出，這個校園生活模式讓「休閒」和「課業」活動在更壓縮、競爭的過程中進行。因此，公立高中興盛的社團活動其實發揮了讓學生順應、甚至「同意」以填鴨考試、競爭為核心的升學體制的社會功能。這些發現的主要意涵在於，探討學生的升學實作和日常活動之間的關係，以及這項關係對學生集體認同形塑、升學策略的影響，有助於對現行的升學制度做出更全面的理解；如此能進一步探討為何明星高中學生會支持造成升學壓力的考試體制，以及既有的升學制度如何在更廣泛的層次上對學生的

創造力與學習策略帶來實質影響，作為教改相關討論的參照。

本文雖以 KG 高中熱音社作為主要個案，田野資料指出該社學生在社團活動的投入，以及追求優越表現的傾向，反映了明星高中學生透過追求「能K能玩」來與他校同儕區別的集體文化。除了部分文獻的類似發現（如林雨潔 2010；崔治中 2012），我在田野中還觀察到在其他的明星高中社團也有相似傾向。舉例來說，中、南部第一志願男校的熱音社成員，同樣有「高一高二認真玩社團，高三認真拚大學考試」的校園生活模式；在這些社團中，成員為了成發蹺課也是常見現象。³¹此外，我在前文所提「生物研究社成員強調玩到被當」、「藝文性社團秀公假單的文化」等案例，在本研究中皆為明星高中學生展現「能K能玩」的案例。儘管不同明星高中社團之間有著上述的相似性，本研究的可推論性並非毫無限制。舉例來說，就算同樣是追求「能K能玩」，並非所有「明星高中」熱音社都能達成與 KG 熱音社同樣的升學表現。雖然「菁英地位認同」同樣是促使學生在社團與休閒領域上爭取秀異成就的主要動力，男、女校之間還是有著活動方式上的差異（如女校熱音社傾向透過「請假」爭取社團活動的練習時間，不太可能有翻牆蹺課的情況出現）；不同類型的社團之間，在「玩」層面上也會有程度上的差異（如熱舞、熱音、吉他通常因為需要高強度的練習時間而容易被視為是「玩很大」的社團）。

在概念的層次上，本研究所探討的「能K能玩」可被視為一個用以分析高中青少年文化與升學實作的「理念型」（ideal type）。透過此一理念型架構，我期待未來的相關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類型的學校或學生群體組織之間，在休閒生涯與升學經驗上，各有何異同之處，以及這些異同又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脈絡差異。在本文

31 我分別在台中、台南以及高雄訪談第一志願男校熱門音樂社的社團領導幹部。這些地方的第一志願受訪者直接向我指出，他們通常只會將台北的「六校」與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的第一志願學校視為比較對象，不會把同區域其他高中的學生放在眼裡。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我在本研究進行期間無法擴及更多的縣市（如宜蘭、花蓮、台東），以及這些縣市中不同類型的學校間之間的差異。這些面向都有待日後的研究進行更為細緻、深入的探討。

中，我針對中後段學校學生進行的輔助性田野調查及訪談，讓這份研究能從比較的視野來定位台灣菁英青少年文化生活和教育經驗之間的關係。然而，過度側重菁英學生的經驗仍是本研究的主要限制。舉例來說，對比於前段學校的校園次文化與升學實作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類似的次文化生活在後段學校學生的教育經驗中分別扮演何種角色？不同志願序、分流機制的青少年分別如何經驗教育體制，他們的教育經驗與文化生活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係模式？這些對於他們的社會流動、地位取得帶來什麼影響？以上都是有待進一步釐清的重要問題。同時要強調的是，本研究所探討的「能K能玩」是隨台灣社會歷經解嚴、教改逐漸出現的校園文化。近年正值台灣教育政策轉型過程，相關政策變化必然會對本文所分析的校園生活模式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舉例來說，教育部將在一〇八課綱引進的「學習歷程」制度，很有可能在大學申請入學時，便提高學生在校成績的重要性。這項制度的引入，加上大學考招模式的改變，會對本文所分析的校園生活安排方式、社團同儕文化、學生的教育生涯帶來何種變化（如是否會對「玩兩年，念一年」的校園生活模式帶來衝擊？），也有待未來研究持續追蹤、討論。

誌謝：本研究承蒙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學金資助（DF016-U-12）。本文得以出版，首先感謝所有的田野報導人，你／妳們深刻的音樂與學習經驗是孕育這篇論文最重要的泉源。本文初稿〈學做菁英〉發表於 2017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感謝評論人吳齊殷教授提供深具啟發性的評論意見。我也要特別感謝蔡虹音、胡景祥、謝易澄的悉心閱讀，安勤之、林凱衡、高子壹、王安琪在討論會上對本文初稿的回饋，以及李耀泰博士在本文修改期間所提供的意見。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台灣社會學》編委會寶貴的修訂建議，使本文得以更為清晰周延。文中若有任何錯誤疏漏之處，概由我負責。

參考文獻

- 王心怡，2007，《女孩們的課業生活：高中女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震武，2002，〈升學主義的成因及其社會心理基礎——一個歷史觀察〉。《本土心理學研究》17: 3-65。
- 王震武、林文瑛，1994，〈傳統與現代華人的「士大夫觀念」——階級社會的素樸心理學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10: 119-164。
- 朱夢慈，2017，〈創造「好青年」的台灣搖滾樂團潮：以鄰坊型熱門樂器行為中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6: 1-40。
- 羊憶蓉，1994，《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北：桂冠。
- 吳佩穗，2001，《高中女校學生次級文化之民俗誌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吳佳盈，2011，〈舞到西門町：從空間解嚴到主題樂園〉。《文化研究月報》117: 1-23。
- 吳齊殷，2005，〈學生〉。頁 345-379，收入台灣教育社會學會編《教育社會學》。台北：巨流。
- 李奉儒，2008，〈台灣政治解嚴以來的教育改革論述之評析〉。頁 1-29，收入蘇永明、方永泉編《解嚴以來台灣教育改革的省思》。台北：學富。
- 周祝瑛，2003，《誰捉弄了台灣教改（1987~2003）？》。台北：心理。
- ，2008，《台灣教育怎麼辦？》。台北：心理。
- 林大森，2002，〈高中／高職的公立／私立分流對地位取得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25(1): 35-62。
- 林文源、陳晉煦，2012，〈單車品味政治：以 2000 後台灣新竹市文化競逐為例〉。《台灣社會學刊》49: 147-205。
- 林文蘭，2013，〈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0: 43-114。
- 林雨潔，2011，《三位進入非理想大學的明星高中學生之自我概念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婉雯，2011，《國中青少年友誼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珮雯，2008，《高中生抗拒型態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馬培治等，2007，《附中野史 2：非杜撰的城堡》。台北：商周。
- 張明宜、吳齊殷，2013，〈友誼網絡中誰的獲益更多：青少年友誼網絡與學業成就的動態分析〉。《台灣社會學》26: 97-146。
- 崔治中，2012，《人生十八才開始？明星高中的青少女文化》。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春木，2008，《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的發展與解決對策（1945-2007）》。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台北：心理出版社。
- 楊國樞、葉啟政，1984，〈升學主義下的教育問題〉。頁 357-384，收入楊國樞、葉啟政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
- 楊鎮宇，2008，《教師工會運動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體罰論述：從批判教育學觀點的反思》。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書宏，2015，《如何養出「好學生」——台灣教育脈絡下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慣習》。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婉琪，2001，《政治控制、教育管制與升學主義：歷史社會學的詮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民岳，2008，《跳出「中」心，吃進中「華」：北市官辦大眾節慶的文化政治（1994-2006）》。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47。
- 薛承泰，1996，〈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台灣社會學刊》20: 49-84。
- 簡妙如，2001，《流行文化，美學，現代性：以八、九〇年代台灣流行音樂的歷史重構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羅悅全（筆名尤大鑼），1992，〈M.I.T.（Metal in Taiwan）：兼論台灣搖滾論述的發展〉。《島嶼邊緣》5: 88-95。
- 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 97-140。
- 蘇永明、方永泉編，2008，《解嚴以來台灣教育改革的省思》。台北：學富。
- Becker, Howard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Bennett, Andy. 2000. *Popular Music and Youth Culture: Music, Identity and Place*. London: Macmillan.

- . 2001. *Cultures of Popular Music*.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 .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 Breen, Marcus. 1991. "A Stairway to Heaven or a Highway to Hell?: Heavy Metal Rock Music in the 1990s." *Cultural Studies* 5(2): 191-203.
- Byun, Soo-yong, Evan Schofer, and Kyung-keun Kim.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3): 219-39.
- Cohen, Albert. 1955.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 Cohen, Phil. 1972.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y."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 2 (Spring).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larke, John,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2006[1975].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p. 3-59 i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rith, Simon and Angela McRobbie. 1990. "Rock and Sexuality." Pp. 317-332 in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ld*, edited by 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London: Routledge.
- Hebdige, Dick.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 Ho, Tunghung. 2003.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andarin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 Hollands, Robert. 2002. "Divisions in the Dark: Youth Cultures, Transitions and Segmented Consumption Spaces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5: 153-171.
- Hollingworth, Sumi. 2015. "Performances of Social Class, Race and Gender through Youth Subculture: Putting Structure Back into Youth Sub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8(10): 1237-1256.
- Macan, Edward. 1997. *Rocking the Classics: English Progressive Rock and the Counter-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Donald, Robert and Jane Marsh. 2005. *Disconnected Youth?: Growing up in Britain's Poor Neighbourhoods*. NY: Palgrave Macmillan.
- MacDonald, Robert and Tracy Shildrick. 2007. "Street Corner Society: Leisure Careers, Youth (Sub)culture and Social Exclusion." *Leisure Studies* 26(3): 339-55.
- MacDonald, Robert, Paul Mason, Tracy Shildrick, Colin Webster, Les Johnston, and Louise Ridley. 2001. "Snake & Ladders: In Defence of Studies of Youth Transiti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5(4): 1-13. Online version: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5/4/macdonald.html>.
- McRobbie, Angela and Jenny Garber. 2006[1975]. "Girls and Subcultures." Pp. 177-88 i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namida, Katsuya.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Rock: A Bourdieuan Analysis." Pp. 120-138. in *Made in Japan: Studies in Popular Music*, edited by Tōru Mitsui. New York: Routledge.
- Murdock, Graham and Robin McCron. 1976. "Youth and Class: The Career of a Confusion." Pp. 10-26 in *Working-Class Youth Culture*, edited by Geoff Mungham and Geoff Pear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Nayak, Anoop. 2003. "'Boyz to Men': Masculinities, Schooling and Labour Transitions in De-industrial Times." *Educational Review* 55(2): 147-159.
- Shildrick, Tracy and Robert MacDonald. 2006. "In Defence of Subculture: Young People, Leisure and Social Division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9(2): 125-40.
- Shuker, Roy. 1994. *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London: Routledge.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 Thornton, Sarah. 1995.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 Willis, Paul. 1978. *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 1981. *Learning to Lab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kins, Amy. 2008. *Wannabes, Goths, and Christians: The Boundaries of Sex, Style, and Stat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